

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系列报道③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深入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激发农业市场活力,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竞争充分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体系;但在尚未完全市场化的涉农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农技推广领域——

谁能补上“纯公益”推广的空白?

■本报记者 秦志伟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不管什么人,只要能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问题,湖北省当阳市褚家湖粮食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邢汉生就很高兴。如果还是免费的,他觉得就更好了。

合作社位于草埠湖镇,这些年,邢汉生没少找镇农技服务中心的农技人员,他们基本能解决邢汉生在农业生产中的问题。这些农技服务也基本都是公益性的。

在邢汉生眼中,农技服务中心还是政府机构,因为他们的服务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实际上,早在2005年,湖北省在全国率先推行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将乡镇农技推广机构的事业单位性质变成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再属于体制内的单位。

13年过去了,改革效果早有定论。《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了解到,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改革的不彻底为以后埋下了隐患,直到现在。其间,各方当事人都为各自利益争吵不断。

幸运的是,部分乡镇农技服务中心的农技人员并没有离开农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涌现,为农技推广贡献自己的力量。

公益性机构变成市场化机构

在湖北,目前的乡镇农技人员自称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后遗症的“受害者”,十堰市房县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余建民就算其中一位。余建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虽然目前他在县农业局工作,但他以前属于乡镇农技推广人员,现在的工资根据“以钱养事”机制发放。

提到“以钱养事”机制,就得追溯到2005年那场改革。

当年,湖北省在全省范围内推进乡镇“七站八所”以钱养事改革,即针对依托乡镇“七站八所”用财政供养专职人员从事农村公共服务的传统体制(俗称“以钱养人”)变为直接性的农村公共服务社会化运行机制。

所谓“七站八所”,是指县市区及上级部门在乡镇的派出机构。这里的“七”和“八”都是泛指,并非确数。

于是,作为“七站八所”之一的农技推广站因此被推向市场,变成民办非企业单位,由之前财政供养的“事业人”变成面向市场的“社会人”,与其他站所合并成农技服务中心。

这次改革一开始就受到部分地区农技推广人员的强烈不满,一位乡镇基层农技人员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了其中的原因。据他了解,当时上级部门集中在湖北平原地区调研,那里经济水平相比山区较高,当时农资市场又没完全放开,大部分农技人员希望改革,这样可以获得更大利益。

面对当时的大环境,应该说改革也是迫不得已。

不得已。

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看来,湖北进行“以钱养事”改革有两个原因,一是取消农业税前“七所八站”人员众多,事业单位效率普遍低下;二是取消农业税后,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以钱养事”则是解决行政运转经费不足的补救措施。

不只是湖北,农业税取消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进行过大幅度的乡镇综合改革,包括改革乡镇事业单位。

记者了解到,唯有湖北在事业单位改革中走得最远,试图建立市场导向型的乡镇事业服务体系,贺雪峰对湖北这种探索精神表示敬佩,“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究其原因就是,乡镇公共服务这类事业几乎无法标准化,也不可能建立完全市场,进而无法考评。离开财政供养的以责任心和体制内考评特征的事业单位的支持,依靠市场的农村公共服务势必会出现问题。

换一块牌子的“七所八站”

一直以来,面对改革,总会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湖北13年前的乡镇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也是如此。

其实,从2002年开始,有关农村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实践就在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出现,湖北咸安区“以钱养事”改革被认为是最富有创新性、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实践,并在短短三年在全省铺开,得到各界高度关注。

实际上,“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具体落

实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余建民告诉记者。

根据改革的设想,就是要消除政府、市场与市场主体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相对分离的局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坚持市场化、社会化供给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经济领域与公共服务领域的双重资源配置作用。同时,通过创建新机制,充分调动发挥市场与社会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三者协同合作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最终构建其并过度搭配健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但事与愿违,改革引起了强力反弹,仅上访事件就让相关部门招架不住,直到目前还有基层农技人员上访。

湖北省社科院“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毛敏今年撰文分析,十余年来,改革并未沿着既有逻辑与设想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导致农技供需严重脱节。

按常理说,既然变成民办非企业单位,就应该依据市场化、社会化原则开展工作。但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农村社会化服务中心一般挂在各乡镇农办或综合治理办公室。

在毛敏看来,本是市场化的服务组织却成了“换了一块牌子的‘七站八所’”,继续接受乡镇政府领导;本已市场化、社会化的供给主体,却成为乡镇政府再收编的“编外人员”,进而承担了更多的行政事务。

有基层农技人员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反映,现在被转的农技人员受到“以钱养事”的限制非常多,比如工资待遇、职位晋升等。现在不管平原地区还是山区的乡镇农技人员,他们非常希望恢复事业单位编制。

事实上也有部分站所确实恢复了,但农技推广站还处在“编外”。虽然有部分地区尝试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农技人员自己也很清楚,没有人真正敢冒这个风险。

但改革已经如此,留下来的乡镇农技人员也尽量守好岗位。邢汉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发现农技人员还经常下乡指导,他有什么问题也经常向他们咨询,“但有时候他们对一些新技术也不是很了解”。

公益性与经营性融合是条路

除了来自人事、组织关系结构的问题,“项目制”管理体制也对“以钱养事”的农技推广体系形成强烈排斥。

以“湖北省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为例,咸安区是湖北省6个试点县市之一,明确重点扶持水稻产业发展,并明确两个镇为试点镇。根据要求,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供给主体必须是市场或社会主体,且以农民合作组织为主,最终在上述两试点镇选择两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该项目的实施。

然而,这一项目一直由当地农业局负责,试点镇党委政府及各农村社会化服务中心无法参与其中。双方没有合作,必将造成交叉重复和浪费。

随着中央支农惠农力度不断增强,测土配方施肥、粮食主产区农技推广、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等投入均已“项目制”方式运营,也时刻排斥着“以钱养事”。

既然是体制问题,余建民表示,只能慢慢调整,“尤其在国家倡导深化改革的时候”。

与湖北相邻的安徽,和全国绝大多数省份一样,农技推广机构属于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安徽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产业联合会会长(以下简称联合会)吕治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层农技推广站有它自己的独特作用,不仅有成熟的人才队伍,还有可以直接拿来用的检测系统,可以节约很大成本。

吕治春举例说,比如建立土壤氮磷钾数据库,如果经营性机构去做,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但农技推广部门本来就有,为什么不把他们纳入进来而直接用呢?

吕治春他们正在探索把公益性与经营性结合起来,“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子”。

据了解,安徽省是在我国率先探索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的地区。2017年,安徽省内200多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共同成立了安徽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产业联合会,这也是全国第一家省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产业组织联盟。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深入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把脉问诊’,激发农业市场活力,创造一个多元化、竞争充分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体系。”吕治春说。

资讯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正式发布

本报讯 日前,《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为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勇介绍,《规划》是依据今年中央1号文件作出的阶段性安排和部署,对今后5年的主要任务作出了具体安排。《规划》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按照分三个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设定了阶段性目标,明确了今后五年的重点任务,提出了22项具体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3项、预期性指标19项,首次建立了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张勇表示,《规划》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围绕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对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等作了明确安排,部署了82项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

余欣荣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规划》对指导全国各族人民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规划》细化实化了乡村振兴各项工作,部署了一系列重大工程、重大计划和重大行动,是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蓝图、总路线图。(秦志伟)

“一带一路”(敦煌)农业合作国际论坛成功举办

本报讯 近日,作为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专项论坛之一,由农业农村部与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敦煌)农业合作国际论坛在甘肃敦煌举办,此次论坛主题为“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绿色农业,合作共赢”。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指出,农业是“一带一路”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建议进一步弘扬丝路精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对接农业政策和制定农业规划、共同建设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路径、共同传承和发扬农耕文明,开创“一带一路”国家间农业交流合作的新局面。

论坛期间,甘肃省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巴基斯坦农业委员会、以色列维昌洋行、阿里巴巴集团、高兴资本集团等分别签署了农业技术、投资、电商等方面的合作协议。(贾禾)

农机化技术推广工作创新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近日,农机化技术推广工作创新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指出,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进入机械化作业主导的新阶段,农机推广工作要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强化创新引领,更加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服务农业、服务农民、服务农村生态的多功能性作用。

会议指出,创新做好推广应用工作是推进农业机械化全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十三五”以来各级农机化技术推广工作亮点纷呈,各类新机具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夯实了基础,为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作出了贡献,为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增添了动能。(恩和)

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报告发布

本报讯 日前,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北京联合发布研究报告《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现状、挑战与新征程》(以下简称报告)。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农业合作作为主要议题之一,首次提出与非洲国家一道制定并实施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规划和行动计划。报告梳理中非农业合作发展的历史及现状,分析新时代背景下双方合作面临的挑战,强调制定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规划与行动计划的重要性,并为规划的制定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

报告指出,制定科学的综合战略规划指导未来的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有助于有效应对挑战,充分发挥非洲农业潜力,深化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层次,统筹协调中方的投资与援助,并在合作过程中与非盟成员国自身的农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有效对接。

报告为此提出系统性建议:首先,应该将政策研究和战略规划放在优先位置,开展有效的政策对话。其次,中非农业合作应当以当地的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与非盟《2063年议程》和《2017—2021年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马拉博宣言》等商业计划相对接。再次,基于当地需求,定位出中非农业合作的重点投资领域。其四,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好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筛选出同样适合非洲发展的经验,建立并改进知识分享的平台和形式,做好经验分享工作。第五,要改善中非农业合作过程中的商业运营能力,扩大私营部门的参与,提高项目的可持续性。此外,要加强与国际组织、双边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的三方合作,做好第三方评估、影响研究和发展传播,整合各方资源和优势,协力促进非洲的农业现

代化和经济发展。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办公室主任、高级研究员陈志钢介绍,报告对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的现状和前景作了客观的分析和探讨,以丰富的数据为支撑为研究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提供了专业视角。

“我们很高兴与关注非洲发展的各位同仁分享研究成果,并希望能为进一步推动非洲实现经济增长和减贫、促进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改善非洲粮食安全贡献知识和建议。”陈志钢说道。

对于报告的发布,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表示,“我们很高兴与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共同支持和参与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十年规划的制定工作,为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的战略重点和方式方法等提供建设性意见。我们相信,中国技术、中国经验和影响能帮助非洲加速实现农业发展和转型”。

此外,报告深入分析了新时期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首先,当前,中非农业合作缺乏综合战略规划和统筹协调,存在碎片化的问题。其次,此前的中非农业合作大多停留在技术层面,缺乏政策、制度和社区经验分享。再次,中国赴非参与农业合作和农业援助的机构和企业,往往倾向于依赖以当地政府为主的单一沟通渠道,而缺乏与当地社会、私营部门、专业人员、社区层面机构和其他双边发展合作机构的协作和联系。其四,中国在非洲的农业项目存在缺乏以当地需求为导向,并且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第五,人员交流存在语言、文化障碍和能力欠缺。此外,国际舆论环境的压力也使合作项目开展面临更大困难。(王方)

两艘3000吨级海洋渔业综合科学调查船“蓝海101”“蓝海201”下水

“农业航母”把论文写在大海上

■本报记者 张晴丹

聚而成。“力争建造出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渔业综合科学调查船,让渔业科研工作者真正把论文写在大海上”成为团队共同的心声。

记者了解到,“蓝海201”船长汤晓林是中科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方面的驻厂监造代表;“蓝海101”的驻厂监造代表是中科院南海水产研究所资产条件处副处长张志强,南海水产研究所禹昊则负责现场具体监造工作……从船体施工到监造验收,每一个步骤都是两所现场监造人员高度重视、全身心投入。

“蓝海101”和“蓝海201”船在沪东中华造船厂的船坞中经历了将近1年的工程施工,两家船东单位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用工匠精神打造大国渔业的海上科考平台。

推进我国渔业资源调查船体系建设

2017年以来,专业渔业资源调查船体系建设步入“快车道”,一批现代化的海洋和内陆渔业资源调查船相继交付,承担起我国近海、内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任务。

此次两艘3000吨级海洋渔业综合科学调查船则具有惊人的“爆发力”,是农业农村部迄今投资最多、吨位最大、设施最先进的科学调查船,操纵灵活,适航性和耐久性较好。船体总长84.50米、型宽15米、满载排水量3281.5吨、续航力达10000海里,配备有国际先进的科学调查系统,技术水平和调查能力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如今,“蓝海101”船和“蓝海201”船成功下水,与“北斗”号及2010年建成交付的南海区渔业资源与环境科学调查船“南锋”号共同成为全国渔业资源调查船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蓝海201”船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供图

这标志着三大海区均有了1000吨级以上专业的海洋渔业调查船,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对深远海的科研探索能力,为我国完善海洋渔业管理制度、科学利用海洋渔业资源、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宋建朝指出,两艘调查船是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国之重器”和“农业现代化标志性工程”之一,它们将成为未来我国开展海洋渔业科学调查的主力军,与三大海区现有和待建的海洋渔业科学调查船相互补充,形成更完整的全国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船体系。

崔利锋表示,我国渔业发展受到更多资源环境方面的约束,近海渔业资源持续衰退,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亟须摸清家底和现状,为科学生产和管理提供依据;传统渔业水域不断减少,过度捕捞长期存在,渔业发展空间受限,亟须调查开发新的渔场;水产品大宗品种供给基本饱和,优质产品供给不足,供给和需求不对称矛盾加剧,亟须调查开发新的资源。

“未来,越来越完备的渔业资源调查船体系正在成形,将成为我国渔业发展最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崔利锋说。